

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部份聯系實際
參考書

中南財經學院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

編者說明：

为了解决同学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缺乏参考書，尤其是缺乏联系中國实际的参考書的困难，特編此集。

內容基本上是按人民大学1957年新提綱上所規定的联系中國实际的参考書目再加上一些最近的重要材料編輯的。

个别講題还加印了列宁斯大林的文章。

中南財經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1957年4月

目 錄

- 一、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論新經濟政策（列寧文集第七冊）……………列 寧（ 1 ）
-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
高速度發展我國的鋼鐵工业（中共八大發言）……王鶴寿（ 18 ）
关于發展輕工业的几个問題（中共八大發言）……賈拓夫（ 25 ）
关于我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人民日报1956年12月
7日）……………未 易（ 32 ）
- 三、社会主义農業集体化
中國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單行本）……………陈伯达（ 40 ）
在社会主义基礎上進一步巩固工農联盟（中共八大發言）
……………鄧子恢（ 51 ）
-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对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國对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主要經驗（人民
日报1956年12月3日）……………胡錫奎（ 64 ）
- 五、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
在各地國民經濟委员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列寧文集第六冊）……………列 寧（ 76 ）
加強党对企业的領導，貫徹执行群众路綫
（中共八大發言）……………李雪峯（ 83 ）
- 六、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
为了社会主义建設，加強全國的計劃工作
（中共八大發言）……………李富春（ 91 ）
- 七、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產与价值規律
不准压級压价……………人民日报1956年9月11日社論（ 100 ）

关于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中共八大發言）	陈 云（102）
使我們的物价更好的促進生產發展（中共八大發言）	李先念（113）
計劃經濟和价值規律（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	薛桥暮（123）
八、社会主义下的劳动与工資	
國務院关于工資改革的決定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30日）	馬文瑞（131）
九、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	
改進日用工业品的生產和分配工作（中共八大發言）	曾 山（145）
关于增產節約問題（政协二屆三次會議發言人民日报1957年3月10日）	陈 云（152）
十、社会主义下的農業	
在全國農業劳动模範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报1957年2月22日）	鄧子恢（157）
中共中央國務院关于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	（168）
十一、社会主义的商品流轉	
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問題（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三次會議發言）	陈 云（179）
論農村自由市場	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社論（186）
十二、社会主义下的國民收入	
正確处理積累和消費的关系（中共八大發言）	薄一波（189）
十三、社会主义下的信用	
改進信貸工作，協助企业節約資金（新華月報1955年9期）	胡景翼（201）

政务院关于設立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的決定（中央人民政 府法令彙編1954年）.....	（ 205 ）
十四、社会主义的再生產	
讀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人民日報1957年6月16日社論（ 206 ）
十五、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產主义	
和第一个美國工人代表团的談話对第十二个問題的答 （ 斯大林全集第十集 ）.....	斯大林（ 209 ）
十六、社会主义世界經濟体系的形成和發展	
八國經濟互助委員會會議的公報1956年5月28日新華社 新聞稿）.....	（ 210 ）

論新經濟政策

列寧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着手報告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首先應保留的，即是，我並不是象在座的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來理解這個题目的，或者毋寧說，我只能夠就這個問題底一小部分來講一下。很自然地，在這個問題上，主要的興趣也許是朝向考察和評價最近蘇維埃政權關於新經濟政策所頒布的一些法令及決議。這些決議案的數目愈多，對這些決議案加以定型化、整理和鑽研的需要性愈是迫切，則對於這個問題發生興趣亦愈是應該，——就我能根據在人民委員會的觀察加以推斷的限度以內說來，這種需要性，現在是日益感覺到了。願意熟知那關於新經濟政策結果的問題所有的事實和數目字的願望，同樣也是應該的。自然，加以証實和檢查過的這些事實底數目，還是很小的，然而它們總是有了。而且，毫無疑義的，為了熟知新經濟政策，去注意這些事實，并試圖把這些事實加以總括，也是絕對必要的。但是，我却不能夠論到這兩個問題當中的任何一個，如果你們對於這兩個問題發生興趣的話，那末我可以担保，你們對於這些問題將能夠找到報告人的。使我感到興趣的，乃是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因政策的轉變而採用的策略，或者說——如果人們可以這樣來表明的話——革命戰略的問題，以及對於下述兩個條件加以評價的問題，即：一方面，這種政策跟我們對我們任務的一般理解適應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日黨的認識和黨的意識跟這種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適合到什么程度。我所願意專門談論到的，就是這個特殊的問題。

首先使我感到兴趣的，就是以下这个问题：在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加以评价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从前的经济政策乃是错误的？将它评定为一种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它是一种错误的話，那末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这种评价可以被认为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现在我們党内关于我們目前经济政策基本问题的意見究竟协调到何种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底注意力，在現時应当是完全集中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的个别问题上呢，或是这一注意力应当是——至少是間或地——專用來评价这个政策底一般条件并处理党的意識、党的兴趣和党的注意力对于这些一般条件的适应问题？我认为，目前的情势是这样的：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对于党底廣大各方，还不是都充分明白了的，因此，如果对于先前的经济政策底错误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那我們就不能順利地完成我們創造新经济政策底基礎以及最后地確定我們新经济政策方向的工作。

为了說明我的意見，而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即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們可以，而且在我的意見認為应当說，我們从前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願意擇取日俄战争底一段插話，來加以对照和比較。我以为，这段插話可以帮助我們更清楚地設想象在我國正在進行的这类革命中各种制度以及政治方法間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所說的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將軍攻取旅順的事件。在这个例子上使我感到兴趣的主要事情，就是旅順的攻占曾經过了兩個絕對不同的階段，第一个階段，是多次的猛烈冲鋒，这些冲鋒，結果都归于失敗，且使这个聞名的日本司令官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大量牺牲。第二个階段，乃是進而依照圍攻術的一切規例，采取了对該要塞的極端費力、極端困难和緩慢的圍攻；可是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而攻取这个要塞的任务才解决了。如果我們把这些事实加以考察的話，那末自然而然地就發生了一个問題：在什么意义上，我們可以把日本將軍第一次進攻旅順要塞的作战方式評定为错误呢？对于这要塞的正面襲击是否错误的呢？如果这样的襲击是错误的，那末，究竟应当在什么条件之

下，日本軍隊為了正確地執行它的任務需要承認這是錯誤的，並且在何種程度上它需要來認識這種錯誤呢？

自然，在最初一瞥之下，似乎認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复是很簡單的。如果對於旅順的多次的正面突襲，都是毫無結果的——而這正是事實——，如果攻襲者以此所招致的犧牲是極端巨大的——而這仍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那末由此就可以顯然地看出，對於旅順要塞進行直接和正面襲擊的策略乃是錯誤的，這一點是不需要任何證明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不難看到，在解決其中包括很多未知因素的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如果沒有相當的實際的經驗，那很難絕對精確地、或近似精確地確定，可以使用怎樣的方式去進攻敵軍的要塞。如果不在實踐上體驗一下，要塞底力量如何——其防衛底能力如何，其駐屯軍的情況如何等等，那末要對這種事體加以確定，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沒有這一點，則甚至一個最好的指揮官——乃木將軍無疑地就是這樣的人物——也不能解決採取適當方法攻取要塞的問題。另一方面，全部戰爭順利結束之目的和條件，也要求對於這個任務加以可能的最迅速的解決；而同時，即使是很嚴重的犧牲，如果對於以正面襲擊來攻取這個要塞是必要的話，那終會得到厚利補償的，這種事情也是非常可能的。這些犧牲可以把日本軍隊解放出來，以便在別的戰場上作戰，而完成最主要的任務之一，使敵人，即俄軍，來不及把較大的兵力調到遙遠的戰場，把這些兵力訓練得更好，而且也許會達到這樣一種地步，使它較日本軍隊強大多倍。

如果把整個軍事行動的發展和日軍作戰行動底條件加以考察，則我們將會達到以下的結論：對於旅順要塞的猛攻，不僅表示了顯然能作重大犧牲的這一軍隊的偉大的英勇氣概，而且也表示了在當時情況之下，即在作戰行動之初，這是必要而有益的——唯一的可能的策略，因為如果沒有用強襲方法攻占要塞這個實際任務來檢查一下力量，如果不體驗一下敵人底抵抗力，那就沒有任何根據來採用那種更加長久的和更加費力的鬥爭，這種鬥爭，正由於它的持久性而含有許多別的危險。從整個作戰行動底觀點看起來，我們不能不把这个行動之第一部分——

由正面的襲击和攻击構成的——視作必要的部分，視作有用的部分，因为——我再重复說一遍——沒有这种經驗，日本軍隊就不能充分地了解斗争底具体情况了，当用直接襲击進攻敌军要塞的时期告一終結之时，这个軍隊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成千成万的人战死了，还要陣亡成千成万的人，但是用这种方法沒有攻取要塞——当有些人或者大多数人得到結論說，应当放棄正面攻击，而改用圍攻的时候，这个軍隊底处境就是如此。既然已經判明策略上有錯誤了，那就要丟掉这种錯誤；凡与这些策略相关联的一切，就須承認是作战行动的一种阻碍，而必須加以改变，要停止直接攻击，改取圍攻办法，改变軍隊的配置，从新分配軍需品及軍火等，关于个别的方法和作战行动就不說了。从前的一切，应当坚决地、確實地、明白地承認是一种錯誤，以便不要在新的战略与策略的發展上，在作战行动底發展上造成障碍物，——这种新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作战行动，現在应当用别的方法來進行了，如我們所知，这种新策略是以全部的勝利而告終的，虽然为时要比所預定的長得多。

我認为，这个例子可用以說明，我們的革命，在解决自己在經濟建設領域內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是处于怎样的地位。在这一关系上，可以分明地划出兩個时期。一方面，大約是从一九一八年初起至一九二一年春止这一时期；另一方面，則是从一九二一年春以來我們現在所处的这个时期。

如果你們回想一下我們的党自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年初所作的一些正式的以至于非正式的宣言，你們就会看到，那个时候，我們就有一种觀念，認为革命底發展，斗争底發展，既可以循着一條比較短促的道路進行，也可以循着一條很長而艰苦的道路進行。但是在估計可能的發展的时候，我們多半都是——我簡直很难記起有任何的例外——从以下这个假定出發的（这一点或者并不是常常公开表明的，但是这一点总是被默認的），这个假定就是直接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設去。我特意把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三四兩月关于我們革命在經濟建設領域內的任務所寫的又重新閱讀了一番，使我確信，我們在当时確是有

这种假定的。

这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象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国家制度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然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退出，众所周知，曾经伴以特别严重的损失和无比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底签订，这个和约使我们接受了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条件）这样重大的、在政治关系上就必要性说来是先决条件的任务，已经解决了。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从一九一八年三月到夏天这个时期，乃是军事任务似乎已经解决了一个时期。但是此后的事件表明了，这并不是这样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间，在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只是刚刚接近了国内战争底开始；这个国内战争，从一九一八年夏天起，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叛乱，便一步步地更加逼近了。那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或四月，在谈到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已经以这样的作战方式，如主要地致力于剥夺剥夺者——而这一特点，也正是革命最初几个月即一九一七年末及一九一八年初之主要的点——与逐渐过渡的方法对立起来。那时我们就已经不得不说，我们在组织核算及监督方面的工作，是大大地落后于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及活动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东西，要多于我们能够计算、监督和管理等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剥夺剥夺者的任务，从粉碎剥削者及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便转到组织核算及监督的任务，转到所谓平凡的直接建设的经济任务上来了。那时，在许多点上，我们都需要后退的。举个例来说，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象按照适应于资产阶级关系，而不是适应于社会主义关系的比率，这就是说，不是按照与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的特别艰苦条件相适应，而是按照与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比率来给予专家以报酬。这种对于专家之非常高度的、资产阶级式的高度的报酬，原先并没有包括在苏维埃政权的计划以内，而且甚至是和一九一七年末发布的许多命令不相符合的。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我们的党却颁发了直接的指示，指出我们在这一方面必须向后退一步，承认某种的“妥协”（我是使用在当时所通用的名词）。全俄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决定，就承認，在一般的薪資制度上采取这种改变，是必要的。

我們曾經是从一个角度來看我們在那时曾經提在前列的建設工作，來看我們的經濟工作的。在那时，曾經假定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无需乎一个使旧的經濟适应于社会主义經濟的預备时期。我們曾經假定，在建立了國家生產及國家分配以后，我們就進入一种与以前的制度比較起來不同的生產与分配的經濟制度了。我們曾經假定，這兩种制度——國家生產及國家分配制度和私人营业的生產及分配制度——在我們建立起國家生產与分配，一步步地將它从敌对制度中爭取過來的这种条件之下，会相互發生斗争的。我們說，我們現在的任务已不是剝夺剝夺者，而是核算、監督、提高劳动生產率、加強紀律等等了。这是我們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及四月間說的，但是我們却不曾提出这样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对于市場，对于商业，究竟將會是怎样的关系？比如在一九一八年春天，當我們与許多反对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同志們論战的时候，我們曾經提出了國家資本主义的問題，其意并不是說，我們要后退到國家資本主义上去，而是說，如果在我們俄國國家資本主义能成为占优势地位的經濟制度的話，那末，我們所处的地位就要和緩些，而我們对社会主义任务之解决，也会变得更加近些。我願你們对于此种情况特别地予以注意，因为在我看來，为了理解我們經濟政策的轉變是在什么地方，并应怎样來估計这种轉變，將以上那一点切記在心里，乃是必要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更具体地、更明白地說明我們的斗争正在其中展开的那些条件。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曾看到私人办的一份“廣告小报”。在我們的三年旧經濟政策之后，这分“廣告小报”就使人不禁發生一种完全不平常的、絕對新鮮而奇特的印象。但从我們經濟政策之一般方法的观点看來，这儿是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的。如果要講这个小的，然而又很独特的例子的話，需要回憶一下斗争是如何發展的，以及在我們的革命中，一般說來，它的目的和方法是些什么。在一九一七年末所頒布的最初的法令之一，就是國家对于

廣告事業的獨占的法令。這個法令包含着什麼樣的意味呢？它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取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假定到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上去的過渡是可能漸進的——不是廢止私人的報紙，而是使它從屬於一定的國家領導，將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常軌上來。因之，那規定國家對於廣告事業獨占的法令，曾假定，私人企業性的報紙，作為一般現象，依舊存在下去，需要私人廣告事業的經濟政策，也將繼續下去，私有財產制度也繼續存在下去，需要廣告及廣告事業的一整列的私人企業，都繼續存在。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占制的法令，其意思，就是這樣而且也只能是這樣。關於銀行事業的法令中，也有與這相似的情形。但是為了不要使這個例子過於錯綜複雜起見，我不打算加以論列了。

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最初幾個星期之內所頒發的，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占制的法令，其命運如何呢？其命運是這樣的，就是它不久就被完全取消了。現在在回顧鬥爭底發展以及從那時以後鬥爭在其中進行的條件時，若依據今日的时代來回想，我們那時是如何地天真，在一九一七年末，我們竟然談到實行國家對於私人廣告事業的獨占，那是可笑的。在決死的鬥爭時期，能夠有什麼樣的私人廣告事業呢？敵人，即資本主義世界，曾以繼續進行鬥爭並將這種鬥爭提到最高的緊張程度和進行到底，來回答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法令。這個法令曾假定，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這樣鞏固地建立起來，以至於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了，服從蘇維埃政權的必要性，對於全體私人企業者和個別小私有者已是如此明顯，以致於他們只能在我們——作為國家政權——所安置的基礎上來應戰了。私人出版物——我們曾說——依舊是你們的；私人的企業性依舊保存下去；供應這些企業所必要的登載廣告的自由依舊保留，只是規定國家對於廣告事業要徵稅，只是規定將廣告事業集中在國家手中而已，如是，私人的廣告制度本身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相反地，給了你們以某種利益，這種利益，往往是跟情報事業之適當集中有關的。可是事實上所得結果，却是我們應當展開鬥爭的地方，並不是在這個場所上面。敵

人，即資本家階級，是以完全否定整個國家政权的行動，來回答國家政权底這條法令。根本就談不到任何廣告事業了，因為在我們制度中所留下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一切，那時都是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於為國家政权之基礎本身而鬥爭了。我們曾經向資本家們建議：“服從國家的調節吧，服從國家的政权吧，這樣，就可以不必完全廢除適合於人民底舊利益，習慣與觀點的那種條件，而可得到用國家調節的辦法來逐漸的改變這一切”，但是，人家卻給我們提出了關於我們自身生存的問題。資本家階級所採取的策略卻是來激動我們作你死我活的無情鬥爭，這種鬥爭迫使我們對舊關係作出比之我們所假定者大得不可以計量的破壞。

關於私人廣告事業獨占制的法令，未有絲毫結果，它依然是一張廢紙而已，生活，即資本家階級底反抗，却迫使我們國家政权將全部鬥爭轉移到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上去，並不是轉移到象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末所天真處理的這些空洞的、甚至可笑的小小問題上去，而是轉移到“存在呢，還是不存在”的問題上去——粉粹昔日薪俸階級底怠工，击退獲得全世界資產階級援助的白黨軍隊的問題上去。

我認為，這個關於廣告事業的法令的特殊插曲，在關於舊策略究竟錯誤與否的基本問題上，提供了有益的指示。自然，現在在從此後歷史發展的前途上來評價事件時，我們不能不認為，我們的這個法令乃是過於天真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是錯誤的，但是同時，這個法令里面也包含有正確的東西，那就是國家政权——無產階級——曾經企圖實行過度到新的社會關係上去，並且尽可能逐漸地和尽可能沒有特殊破壞地，盡量適應於當時既存的关系。敵人，即資產階級，曾運用一切手段，激使我們從事卓絕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戰略上，從敵人底觀點看起來，這是否正確的呢？自然，這是正確的，因為資產階級在這一方面不用直接搏鬥的辦法來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怎樣能突然地服從這個嶄新的、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的政权呢。資產階級向我們答道：对不起，可敬的先生們，我們和你們談判的，並不是關於廣告事業而是關於我們是否還能夠找到弗蘭格爾，高爾察克和鄧尼金；

以及國際資產階級能否給他們以援助，以解決並不是關於你們是否將有關國家銀行的問題。”說到國家銀行，這正如關於廣告事業的情形一樣，在一九一七年末我們曾經寫出了很多很多的東西，但是大半都只是一張廢紙而已。

那時，資產階級曾經用一種從他們的觀點看起來是正確的策略來答复我們：“首先，我們是為了這個基本問題；你們確是國家政權呢，抑或僅是你們以為你們是國家政權——而進行鬥爭，自然，這個問題不是取決於法令，而是取決於戰爭，取決於暴力；進行這個戰爭的人，大概將不僅僅是我們——這些從俄國被逐出的資本家，並且還有那與資本主義制度休戚相關的人們。如果事情的結局，判明世界上其餘的人們都是對此非常關心的，那末國際資產階級將會援助我們這些俄國資本家們的。”從保護其利益的觀點看來，資產階級這種做法是很對的。如果他們對於用最有效的手段——戰爭來解決這個基本問題，還有点滴的希望，那末，他們就不能也不應同意於蘇維埃政權為了能比較逐漸地過渡到新制度上去，而對他們所作的局部讓步了。那時資產階級一定答道：“既不要任何過渡，也不要什麼新制度！”

為什麼曾經造成了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種事態的發展，其原因即在此。一方面是无產階級國家底勝利及一種在人民空前興奮的條件下的不平常的偉大的鬥爭；這種鬥爭乃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這一個時期的特點；另一方面，就是將蘇維埃政權底經濟政策付諸實施的企圖，這種企圖起初是打算能夠借此產生一些逐漸的變化，能夠借此更謹慎地過渡到新制度去，這表現於我剛才所舉的小小的實例中。但它從敵人營壘中所得到的却不是這，而是下面這種回答，就是：進行無情鬥爭的決心，以便決定蘇維埃政權在國際經濟關係的體系中是否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保持其地位。這個問題，只能夠用戰爭才能決定，而這個戰爭又是一個極端殘酷的戰爭，如象國內戰爭一樣鬥爭愈是困難，則謹慎地過渡到新制度中去的可能亦愈少。正如我曾說過的一樣，在此種鬥爭底邏輯當中，資產階級的做法，從他們自己的觀點看來，是對的。但是我們能夠說什麼呢？我們說道：“資本家老爺

們，不要威嚇我們吧。我們除掉在政治舞台上把你們和你們的“立憲”一起打敗之外，还要在这一方面打倒你們的。”此外，我們不能再有任何其他的做法。任何別的作战方式，都等于我們完全委棄陣地。

你們回想一下这种斗争的發展的条件吧，那时你們就会懂得何以会有这种看起來似乎是不正確的和偶然的变动；你們就会懂得，为什么我們依靠普遍的热忱和已有保証的政治統治，便能夠輕而易舉地將立憲會議解散；为什么同时我們还应当試用很多办法，以便逐漸而慎重地过渡到經濟的革新上去，最后，为什么斗争之邏輯以及資產階級底反抗，曾迫使我們改用了最極端的、最卓絕的、不顧一切的國內战争的方式，这个國內战争，曾經將俄罗斯蹂躪了三年。

到一九二一年春天已經弄明白，我們在想用“強襲”方式，即最縮短、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產与分配原則的企圖上，曾經遭受到了失敗。一九二一年春季的政治形势，曾向我們指出，在許多經濟問題上，退却到國家資本主义陣地去，由“強襲”改为“圍攻”，乃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这种过渡引起了某些人的怨言、悲嘆、沮喪、憤怒，那末必須要指出：危險的并不是失敗，而是害怕承認失敗，害怕从这种失敗当中得出一切的結論。軍事斗争，較之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的斗争，要簡單得多；我們所以战勝高尔察克及其夥伴，就是因为我們不怕承認自己的失敗，就是因为不怕學習这些失敗的經驗教訓，就是因为把做得不夠的或做得不好的工作，一再重新做起。

在社会主义經濟反对資本主义經濟这种更加复雜和困难得多的斗争領域內，也須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要害怕承認失敗。要从失敗的經驗中學習。要把做得不好的，更縝密、更小心，更有系統地重新做过。如果我們允許这样的观点：承認失敗，和放棄陣地一样，在斗争中会引起失望沮喪及削弱力量，那末，我們一定要說，这样的革命者，是一文不值的。

我希望，除却个别的例子之外，这对于曾經受过三年國內战争經驗鍛鍊的布尔什維克的任何人是不适用的。我們的力量曾經在于，而

且將來也在于我們清醒地計算最嚴重的失敗，從這些失敗底經驗當中學習那在我們的活動當中應改變的東西。因此，必須要率直地說話。這一點，不僅從理論真理底觀點看起來，是有興味和重要的，而且即從實踐方面看起來，也是如此。如果昨天的經驗還沒有使我們看到旧手法底不正確性，那末今天便不能夠學會用新手法來解決我們的任務了。

轉到新經濟政策的任務，是在於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在國內戰爭的條件下，在資產階級以殘酷的鬥爭形式強加於我們的條件下，試驗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在一九二一年春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乃是這樣一種明白的形勢：不是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是在經濟底許多領域內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不是直接的強襲，而是與許多退却相聯系的持久圍攻之極嚴重、極困難、極不愉快的任務。這就是為了接近於解決經濟問題，而保證在經濟上過渡到社會主義原則去所必需作的事情。

我今天不能引証一些數目字或總結，或事實，來表明這種返回到國家資本主義去的政策給了我們一些什麼結果。我只舉一個小小的實例，你們知道，我們經濟底主要中心之一，就是頓涅茨流域。你們知道，我們在那個地方有着以前的最大的資本主義企業，這些企業都是處在西歐資本主義企業底水平上的。你們也知道，我們在那里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大工業企業：以少數的工人來着手恢復頓涅茨的工業，在我們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現在，在改變政策之後，我們在那里看到什麼樣的情形呢？我們在該地所看到的，正是相反的東西——小型的農民礦山里生產之特別順利的發展，這類礦山正是我們曾經租出去的。我們看到了國家資本主義關係之發展。農民礦山工作得很好，這些煤礦差不多將它們的煤產量底百分之三十以租金方式交給國家。頓涅茨流域生產底發展表明；和今年夏季那種災害般的形勢比較起來，現在已經有了很可觀的一般的改善了；而在此改善上，小礦山內生產底改善之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對它們的開發，曾起了很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夠在這裡詳盡地分析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材料

了，但是你們在这个实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改变底某些实际的结果。經濟生活的复兴（这是我們不論花費任何代价必須獲得的东西），生產率之提高（这也是我們不論花費任何代价必須獲得的），所有这些，我們已因采用局部回到國家資本主义制度的手段而开始獲得了。今后的成績如何，將依我們的技考，將依此后我們正確应用这种政策的程度为轉移。

現在，我轉回头來發揮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春轉到新經濟政策，这次我們退却到國家資本主义活动的手法，方式和方法，是否已經足以使我們能夠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進攻呢？它还不足以使我們这样作。其故在此。如果再就我在最初所举的那比喻（关于战争中的直接強襲与圍攻的实例）來說，我們还没有完成兵力的重新配置，没有完成軍需品及彈藥的重新分配等等；总之一句話，我們还没有完成新的作战准备，而这种新的作战行动，現在应依照新的战略与策略，采取不同的方式了。如果我們現在在向國家資本主义去过渡，那末，就有人要問，要不要做到，使适应于原先經濟政策的那些活动方式不要在現在來妨害我們？不用說——我們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我們是須要做到这一点的。在今年春季，我們曾經說过，我們將不怕回到國家資本主义去，我們曾經說过，我們的任务正是組織商品交換。一九二一年春季以來許多的法令与条例，巨量的論文，整个的宣傳工作，一切立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商品交換的。商品交換这个名詞，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名詞所預定的建設計劃——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是什么呢？曾預定在全國範圍內用或多或少社会主义的方式把工业生產品与農业生產品交換，并借此种商品交換來恢复社会主义組織之唯一基礎——大工业。結果如何呢？結果是——現在你們从实际中都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而且現在这从我們全部的報紙上也可以看出來了——：商品交換是已經崩潰了；所謂崩潰，是就它采取了買賣的形式这种意义上說的。如果我們不願意躲避隱藏，如果我們不願意假裝为看不見自己失敗的人，如果我們不害怕正視危險，那末我們現在就不得不意識到这一点。我們必須意識到，